文艺与传媒丛书
（第二辑）

泛传播时代的媒介想象

杨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文艺与传媒丛书
（第二辑）

泛传播时代的媒介想象

杨华 著

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
藏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泛传播时代的媒介想象/杨华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4
ISBN 978-7-5161-7839-3

Ⅰ.①泛… Ⅱ.①杨… Ⅲ.①传播媒介—研究 Ⅳ.①G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5755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罗 莉
责任编辑 刘 艳
责任校对 陈 晨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3
插 页 2
字 数 223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1辑

解放初期《展望》周刊实行公私合营的历史考察 …… (3)
1949—1956:社会主义期刊事业的初步建立 …… (12)
1957—1965:社会主义期刊事业的艰难跋涉 …… (22)
英华书院与近代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 …… (32)

第2辑

略论勒温对传播学研究的贡献 …… (43)
知识经济时代与大众传播 …… (51)
微弱的辩证:传播批判理论研究 …… (61)

第3辑

《读者》的想象
——媒介文化研究语境中的《读者》杂志透视 …… (123)
主体意识与消费倾向:我国新闻娱乐化现象之反思 …… (138)
西部电视剧创作的资源问题 …… (148)
媒体融合时代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 …… (176)

后记 …… (204)

第 1 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解放初期《展望》周刊实行公私合营的历史考察

一

《展望》是一份带有时事述评性质的综合性周刊，1948 年 5 月 1 日由著名爱国人士黄炎培先生和他所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与之前亦由其创办的《生活》和《国讯》一脉相承，共同“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历程”[①]，设有固定的专栏、专论和通讯报道，16 开本，6 号字排印，每期内容约 4 万字。

1925 年 10 月 11 日创办的《生活》周刊，最初以“专门宣传职业教育及职业指导的消息和简要言论”[②] 为宗旨。邹韬奋担任主编后，《生活》的言论变得更加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也更加激进，最终脱离中华职业教育社而独立。为此，黄炎培等人又另行创办《国讯》周刊，共发行上海版、重庆版、香港版、桂林版、昆明版等总计 457 期，直陈时弊，提倡民主，影响很大，于 1948 年 4 月 9 日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但是，专制的统治无法阻挡人民高涨的爱国热情，仅仅 21 天之后，《展望》周刊就摆在了广大读者的案头。

新创的《展望》周刊几乎是采用《国讯》的原班人马，实行三级管理体制，最上层是社员大会，有黄炎培、杨卫玉、马寅初、孙起孟、盛丕华、陈仁炳、尚丁等 39 名社员；中间层是社长、副社长，由俞寰澄任社长，黄炎培和陈仁炳为副社长；然后是财务委员会与编辑委员会，盛丕华

---

① 尚丁：《〈展望〉周刊始末》，《新闻研究资料》总第 16 辑，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87—197 页。

② 同上。

担任财务委员会主席，杨卫玉担任编辑委员会主席，由黄炎培、杨卫玉、王元化、尚丁等15人担任编辑委员，具体负责周刊的编辑与发行事务。《展望》在形式上与《国讯》极其相似，在内容上也继承了其文人论政的一贯传统，言论更加激烈，战斗性更加明确，不仅“大胆揭露国民党军事上的惨败”，而且“还尖锐地揭穿国民党‘和平攻势’的骗局，向广大人民指出前途，鼓舞人民的斗争”①，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支持。在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发行量就飙升至惊人的53000份。反对政府的杂志一纸风行，自然会招致当局的仇视与迫害。1949年3月19日，刚刚出至第3卷第18期的《展望》，被嫉恨已久的国民党政府无情地查封了。

上海解放后，《展望》周刊在第一时间获得人民政府的批准登记，于1949年6月1日率先复刊，尚丁任社务委员会主席兼主编。1951年，在期刊界较早实现公私合营。1954年，扩大为新知识出版社，《展望》周刊成为该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室。1958年，新知识出版社改组为教育出版社，《展望》周刊被划转至人民出版社。1961年停刊。前后共出刊680期。

二

作为一份私营性质的同人期刊，复刊初期的《展望》周刊在内容和风格上依旧模仿早期《生活》周刊的短小精悍与生动活泼，虽然“整个业务尚在萌芽期内”②，但刊物的发展势头良好。由于认识到邮局发行的重要性，较早地确定了走群众路线的发行策略，《展望》很快就从5200份的发行低谷走出。相关资料显示，1950年9月的期发行量为45000份，1951年4月的期发行量为70000份。在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上，《展望》作为期刊界的代表，与《新华月报》《科学技术通讯》《新农村》《学习》《中国青年》等杂志一道，向全国同行介绍了各自的成功经验。

《展望》是全国范围内较重要的私营期刊之一。1951年前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出版总署的领导同志曾多次嘉许，认为“《展望》正走着《生

① 尚丁：《〈展望〉周刊始末》，《新闻研究资料》总第16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2年版，第187—197页。

② 《各期刊社代表在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分组会上的工作经验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2》，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68页。

活》周刊的道路，它是为大家所需要的，是有前途的”①。在业务上，《展望》积极开展调查研究，主动与相关领导部门沟通，及时地确立了刊物的发展方向，即“以全国城市的知识市民、农村的知识分子、中小城市的基层干部为主要的读者对象，为了真正深入这个阶层还需要更短小多样，趣味而不低级，除时事问题外，并谈生活、思想、社会问题，由小见大，使读者提高一步”②，并据此而成功改版。在经营上按企业化的要求规范自己，精打细算，基本做到了收支平衡，略有盈余。

然而，看起来已经步入发展快车道的私营期刊《展望》，却出人意料，向有关部门递交了《展望周刊关于请求改组为公私合营的报告》(1951 年 4 月 19 日)，郑重提出：

> 一、在性质上正式改组为公私合营，请求作 5 亿元或 3 亿元（笔者注：旧币 1 万元约折合新人民币 1 元）之投资。
>
> 二、在政治上明确地予以领导。
>
> 三、在发展上请以适当方式在全国范围内扩大影响，消除某些人的成见。
>
> 四、在人力上请给予相当补充。③

按照《展望》方面的说法，关于公私合营的请求是经过多方面长期商讨之后做出的慎重决定，是期刊克服当前困难，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唯一路径选择。

对于《展望》周刊的这一请求，华东军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高度重视，会同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约请《展望》负责人进行多次协调，于 1951 年 6 月 13 日形成初步意见并以请示报告的形式上报出版总署。该请示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 关于展望周刊社请求改为公私合营一事，经邀同该社尚丁同志数度商谈，为协助该社业务上有进一步发展起见，拟同意改为公私合营

---

① 《展望周刊关于请求改组为公私合营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 3》，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87—189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 组织。并由我局投资2亿元，上海市新闻出版处投资1亿元，共计3亿元。由沪处派员参加该社董事会进行领导。至于其内部管理及业务方针等仍照旧进行，不拟有何变动。现该社正进行整理旧有资产，准备改组。①

从中可以看出，华东及上海方面完全同意《展望》关于公私合营的请求，不仅按下限拟满足其3亿元的投资要求，而且承诺只派员参加董事会，进行宏观性的领导与监督，对具体的期刊编辑方针和编辑业务则不准备有任何干预。没有烦琐的谈判，也没有复杂的上下关系协调，公私合营之事从一开始就显得异常顺利。很明显，合作双方的目标是一致的：使《展望》周刊在业务上有进一步的发展。也正因为如此，政府和期刊之间才能够彼此信任，坦诚相待。《展望》周刊在尚未得到高层的肯定答复之前，就先行着手“整理旧有资产，准备改组”，即为明证。

大约一周之后，出版总署正式复函，就《展望》周刊由私营性质改为公私合营性质一事做出了明确的答复：“关于展望周刊社改为公私合营事，你局所提意见，我署原则上同意。究竟投资若干，是否由你局投资2亿元即可，希根据实际情况酌定。”② 除了在投资问题上有所保留之外，出版总署悉数同意了华东军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的意见。这或许与尚丁之前的北京之行有关。1950年底，尚丁代表《展望》周刊赴京，向出版总署以及中央宣传部的领导同志汇报工作，获得了领导部门的首肯与支持，为以后顺利实行公私合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1年7月1日，《展望》被批准公私合营，从此“跨进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也更快地成长壮大起来”③。仅以1955年为例，《展望》的期发行数即高达30万份之多，是名副其实的大刊，影响遍及全国各地。

---

① 《华东新闻出版局关于展望周刊请求公私合营的请示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3》，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86页。

② 《出版总署同意展望周刊社改为公私合营的函》，《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3》，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85页。

③ 尚丁：《〈展望〉周刊始末》，《新闻研究资料》总第16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2年版，第187—197页。

三

就解放初期的形势来看，《展望》作为一份私营期刊，还是比较成功的。那么，它为什么要在短期内选择公私合营呢？

《展望》方面给出的理由是，刊物发展中遇到了亟待解决的困难，具体如下：

> 一、从政治上说，展望这个任务是重大的，但是在配合宣传教育这方面，是做得很不够，配合得不够好、工作上也有缺点。
>
> 二、因为是私营的，难免使有些读者存有成见，有些发行干部不予认真发行，更有些地方党政机关的负责干部，自己既不看展望，又不经调查研究恁成见反对别人阅读。这种观感，相当严重的影响了展望的正常发展。
>
> 三、从经济上说，由于业务发展的需要，以及纸张供应失调，必须适量的购储与订货，资金周转上就显得相当拮据，需要增加资本。
>
> 四、由于这一工作的重要与发展，需要在人力上有相当的补充。①

四点理由中，政治方面的理由基于《展望》自身的历史使命而提出，“配合得不够好”，与其说是期刊待解决的难题，倒不如说是期刊发自肺腑的一种自我检讨，全然脱却了原有的某种独立性和文人气质；发行方面的理由基于《展望》的生存环境而提出，由“成见”而产生不良“观感”的，既有读者对象，也有发行干部，甚至还有党政机关的领导，在如实反映期刊所面临的恶劣的生存环境的同时，也隐约暴露了期刊界公与私之间的矛盾重重；资金方面的理由基于《展望》的发展需要而提出，“纸张供应失调”导致周转资金拮据，道出了私营期刊发展的辛酸与艰难；人员方面的理由基于《展望》的存在价值而提出，“需要在人力上有相当的补充”，不仅委婉地表达了期刊希望公私合营的诚意，而且也表明期刊早就

① 《展望周刊关于请求改组为公私合营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3》，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87—189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做好了被改组的准备。从小心翼翼的措辞与行文中可以看出，第二条和第三条理由是实质性的，换言之，《展望》之所以要公私合营，是因为自己无法解决遇到的难题，只有政府才可以搭手拯救。可以想见，作为公方的政府以扶危济困者的角色出现，公方强势，私方弱势，公私合营从一开始就有点不对等。

实际上，《展望》周刊自下而上地提出公私合营之请求并乐意接受领导，与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前后我国期刊出版领域的形势变化密切相关。1950 年 9 月，鉴于“出版业长期在反动统治下所受到的严重摧残，一时还不易恢复，公营出版业在领导和管理方面还未完全统一，私营出版业有一部分在经营上遭遇困难，如不设法加以调整，就不足以担负起将要来到的文化建设高潮的任务”①，出版总署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储安平代表期刊组在全体大会上作的工作报告认为，全国共有 142 家公营（包括公私合营）期刊和 96 家私营期刊，普遍面临稿源缺乏、不易掌握政策、不能更好地结合实际、不能更好地联系读者等问题。尤其是私营期刊，愿意在思想政策上得到有关部门的领导，希望公营期刊在稿源等问题上能够予以照顾，希望新华书店在发行上能够一视同仁。② 会议最后通过的决议指出：“各种期刊应根据其性质及读者对象，逐步做到专业分工，以消除目前存在着的重复混乱现象……尽可能充实期刊的编辑部，使能掌握政策，联系实际，团结读者、作者。”③ 与此同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的指示也完全肯定了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的成果，强调“书籍杂志的出版、发行、印刷是与国家建设事业、人民文化生活极关重要的政治工作。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决定本着‘统筹兼顾，分工合作’的原则调整公私出版业之间的关系，并逐渐消除出版发行工作的无组织、无计划的现象，以求有计划地充分供给为人民所需要的各种出版物。这个方针是正确的”④。上海是当时全国出版业最集中的地区，因而出席会议的代表名

---

① 方厚枢、魏玉山：《中国出版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6—37 页。

② 《各分组组长在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全体大会上的工作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 2》，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86—587 页。

③ 《出版总署关于发布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五项决议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 2》，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651 页。

④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 2》，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642 页。

额最多，有103人，《展望》周刊的沈鹤如即为其中之一。可以看出，在中央政府对新闻出版事业采取比其他行业更早的公私合营政策的前提下，作为“政治工作”一部分的私营期刊要得到发展，不仅每天要应对诸如稿源不足等一些迫切的现实问题，更关键的还是要彻底解决新社会与旧角色之间的冲突。从这个意义出发，对《展望》周刊而言，最佳的选择只能是公私合营。

相对而言，《展望》周刊与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历史渊源也是促使它较早选择公私合营并很快获批的重要原因。从1948年9月到1949年3月被查封的半年多时间里，应黄炎培先生之邀，中共上海地下党指派王元化（化名王清园）具体负责《展望》的编辑工作。在共产党人王元化的主持下，《展望》一方面仰赖黄炎培先生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另一方面利用敌人的自相矛盾之处，使用灵活的笔法，从夹缝中做文章，最大限度地刊发了一批反映解放区真相以及解释中国共产党相关政策的文章。其中一部分是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撰写的文章，因为能够直接传达党的声音，还一度成为《展望》的重要卖点。从某种意义上讲，《展望》周刊是解放前党在上海直接掌握的唯一公开刊物，渊源不可谓不深。也许出于这种原因，“《展望》复刊以后，党和政府对它的关注与帮助是无微不至的，也受到了广大读者热烈的爱护和支持”[①]。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准备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为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做出贡献的《展望》走向公私合营之路就显得合情合理。

此外，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新中国成立后，一个公营、私营和公私合营并存的新闻出版格局曾存在过一段时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结束时，我国的新闻出版事业就彻底完成了转型，形成了一个新体系。这一新体系的建构，我们既可以认为是以党报党刊为中心、以集中统一为特征的公营新闻出版事业的建立过程，同时也可以认为是私营新闻出版业迅速消亡的过程。从最近的学术动向来看，运用“消亡论”去考察像《展望》周刊一样的传媒机构，则是一个全新的角度。

学术界对私营新闻出版业消亡过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消亡原因的探讨上，多以私营报纸的历史考察为主，所持看法大致有：一是同意公私

① 尚丁：《〈展望〉周刊始末》，《新闻研究资料》总第16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2年版，第187—197页。

合营“只是在经济上有些私股暂予保留，而报纸实际上已成为党报”[①] 的看法，指出公私合营是当时经济形势下私营报业的必然选择，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当时实行的一系列政策使私营报业面临的制度环境逐渐演变为政府管制的计划体制，报业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发行和广告）逐步萎缩。[②] 二是承认私营报业消亡是历史的必然，只不过原因不在政府方面，而在于私营报业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和运作机制不适应新中国的管理体制，难以支撑。中国共产党有希望私营报业健康生存的主观愿望，并对允许出版的私营报业给予了极大的扶助。私营报业走公私合营之路体现了其自觉自愿和与政府配合协作的积极态度。[③] 三是认为私营传媒的消亡是由其所有制性质、活动特征以及意识形态属性决定的，是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表现。随着党的各级机关报逐渐承担起综合性报纸的功能，中央政府各部门报刊逐渐成为本系统指导工作的渠道，私营传媒已经没有多少立足之地。传播环境尤其是制度环境的变迁超出了私营传媒通过改善经营管理自我调整的能力，是私营传媒消亡的根本原因。[④]

第一种看法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出发强调私营报业赖以生存的经济根源；第二种看法从党和政府的立场出发强调私营报业的自身缺陷；第三种看法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出发强调私营传媒的意识形态根源。研究报纸的结论，并不必然对期刊有效，但“报刊一家”的说法也有一定道理，毕竟都属于新闻出版业。所以，如果用上述看法来分析期刊，也未尝不可。笔者认为，《展望》周刊之所以选择公私合营，根据它所处的实际情形来判断，应该说三者兼而有之，只不过存在一个孰轻孰重的问题。

四

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的期刊事业经历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可以称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

---

① 孙旭培：《解放初期对旧新闻事业的接收和改造》，《新闻研究资料》总第4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1页。

② 施喆：《建国初期私营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新闻大学》2002年第1期。

③ 曾宪明：《解放初期大陆私营报业消亡过程的历史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2期。

④ 李斯颐：《也谈建国初期私营传媒消亡的原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

下的社会主义期刊事业的初步建立时期。一方面对旧期刊进行大力整顿和改造，另一方面创办更多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期刊，社会主义期刊事业的创建工作就在私营期刊和公营期刊的此消彼长中急速推进。据出版总署统计，1950 年全国有私营期刊 113 种，占当时全国期刊出版总数的 38.3%，1951 年的私营期刊也是 113 种，但占全国总数的比例却下降为 24.3%，之后私营期刊的数量开始急剧下降，截至 1952 年 10 月有 70 种，截至 1953 年 9 月有 36 种，截至 1954 年 12 月有 29 种，截至 1955 年 12 月只有 9 种，到 1956 年私营期刊就彻底消失了。

笔者认为，在这样一股公营期刊事业高歌猛进、私营期刊事业渐趋衰亡的时代洪流中，《展望》周刊于 1951 年实现公私合营，不仅可以解读为历史的必然，更可以解读为必然的历史。换言之，不是《展望》选择了公私合营，而是公私合营选择了《展望》。就一份期刊而言，这种选择可以延长它的生命，使其更好地实现创办者的意愿，为读者服务。就解放初期的期刊整体而言，这种选择使公营期刊越来越壮大，私营期刊越来越衰弱，社会主义期刊事业借此而繁荣，毫无疑问，具有典型的示范意义。

1949—1956：社会主义期刊事业的初步建立

一

一般而言，所谓社会主义期刊事业，基本上等同于新中国的期刊事业，以1949年为起点，迄今恰是60年。置身于这样一个颇具纪念意义的历史节点，我们回顾往昔，总结经验，既为共和国60周年捧一份墨香，追求蕴藏其中的象征意义，亦为挖掘传之后世的借鉴价值。

学术视野中的社会主义期刊事业，其源流可能更长一些，它的发展脉络至少可以追溯到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办刊理论和实践活动，以及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独立自由为民请命的那些进步报刊的鲜活经验。中国共产党人一贯重视报刊的宣传和鼓动作用，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对党的宣传工作就曾有过这样的勾勒：

> 杂志、日刊、书籍和小册子须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办。
>
> 各地可根据需要出版一种工会杂志、日报、周报、小册子和临时通讯。
>
> 无论中央或地方的出版物均应由党员直接经办和编辑。
>
> 任何中央地方的出版物均不能刊载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①]

---

①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摘宣传部分）》，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这段决议文字的中心意思不外乎两点：一是党组织必须创办出版物（包括杂志、报纸、书籍和小册子等）；二是党的报刊必须由党掌管且只能传达党的声音。[①] 此后，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文件当中，不断重复和肯定上述思想，并且不遗余力地付诸实践。中共党史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前锋》《布尔塞维克》《中国青年》《中国农民》《共产党人》《解放》《中国文化》等期刊，或是党直接掌控的理论刊物，或是党领导下的群众性刊物，在中国革命从弱小走向胜利的征途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为社会主义期刊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与此同时，像《新生》《大众生活》《文萃》《观察》一类的期刊，由一大批爱国进步人士主办，他们利用合法的身份，坚守在大城市，反抗暴政、争取和平，为社会主义期刊事业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宝贵经验。

二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的历史从此踏上了一个新的起点。从 1949 年 10 月到 1956 年底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后继续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封建残余势力和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建立巩固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迅速恢复国民经济，有计划地开展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作为思想宣传领域的重要阵地，我国的期刊出版事业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接受旧社会沿袭下来的期刊业并对之进行必要疏导整顿的同时，不断组织创办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刊物”[②]，可以称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期刊事业的初步建立阶段。

其实早在新中国正式成立前的几个月，期刊事业的社会主义引擎就已经发动。先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于 1949 年 2 月在北平成立，并于同年 10 月 3 日至 19 日召开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毛泽东非常重视这次会议的召开，为大会题词：“认真做好出版工作。”胡愈之在大会

---

① 黄旦：《从“不完全党报”到“完全党报”——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再审视》，载李金铨《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51 页。

② 张伯海：《新中国期刊五十年》，载《中国出版年鉴（2000）》，中国出版年鉴社 2000 年版，第 14 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